

新世紀的澳大利亞海軍戰略

海軍上校 林文隆、海軍中校 宋蔚泰

提 要：

海洋國家之威脅及利益均來自海上，故「海上安全」即等於「國家安全」；「海洋戰略」即為「國家安全戰略」，隨著亞太地區各國對海洋戰略利益日益重視，並積極提升海軍實力確保國家海上利益，追求區域穩定以確保其海上安全，已成為新世紀澳大利亞國防戰略的主軸，而「強化海軍投射能力」與「保持前沿部署」是澳大利亞海軍必然的發展方向，亦成為澳大利亞海軍戰略中的核心概念，並藉美海軍〈廿一世紀海權計畫〉執行軍事轉型，使其具備「海上打擊」、「海上盾牌」、「海上基地」及「武力網」等作戰能力，並以非傳統威脅及區域穩定之概念將澳大利亞海軍任務多元化而成三位一體之戰略功能，以便應付現今之挑戰，更具備參與亞太周邊國際事務之能力，以達成「合作安全」的概念。

關鍵詞：澳大利亞海軍戰略、21世紀海上力量、三位一體、前沿部署

Abstract

The survival and the benefits are linked with various maritime activities for a maritime country. National security is required to closely link up the maritim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For Asia-Pacific nations, Maritime benefits nowaday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mong regional countries which all positively expand naval capabilities to guarantee their maritime interests. In order to guarantee its maritime security through pursuing the regional stability, Australia's primary national defence strategy must attach to the US Asia-Pacific security alliance. The key strategic concepts of Australian maritime strategy continue to be 「Naval Power Projection」 and 「Forward Deployment」, which has already become the major concepts of Australian national defense of the

21st century.

Besides, it also needs to develop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with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as an auxiliary for its security. Australia seeks to conduct military transform and sets out the Royal Australian Navy's unique place within a joint and integrated 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by 〈Sea power 21〉 from US, which include 「Sea Strike」, 「Sea Shield」, 「Sea Base」 and 「Forcenet」. Australian Navy prepares for and operates across the possible spectrum of operations. The 'triangle of sea usage' is an extremely useful means to describe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key roles of maritime forces: military, diplomatic and constabulary, and finally complete the goal: 「Maritime Security Cooperation」. Keywords: Australian Maritime Strategy, Sea Power21, Triangle of sea usage, Forward diplomacy

壹、前言

眾所週知，澳大利亞是個海島國家，是世界上海岸線最長的國家之一，同時也是世界上海洋國土面積最大的國家之一，擁有面積位居全球第二的大陸架，專屬經濟區的面積更是多達1,600平方公里，居世界第四¹。澳大利亞從海洋獲得財富，也從海洋得到安全，甚至可以說澳大利亞的邊境線完全在海上，而不存在陸上邊境，其對海洋的依賴程度與從海洋獲得的利益是成正比的，而廣闊的海洋國土和漫長的海岸線也需要一支強大的海軍來保護，正是因為要從海洋獲得財富和安全，才更要在海上建立起堅固的堡壘。故澳大利亞海軍戰略在整個國防體系中向來都佔據著主體地位，控制海洋，保衛澳大利

亞的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是澳大利亞皇家海軍(Royal Australian Navy, RAN)永遠的使命。

澳大利亞海軍在與美國軍事同盟及前沿部署戰略之基礎下，期能於建構與維護區域穩定中扮演一重要角色，故必須具備多功能及多樣化的特質。從《澳大利亞海上準則》中對任務之定義與分類可知，澳大利亞海軍對海上戰爭之認知，正隨著美海軍戰略之轉向應付地區衝突而改變，已不僅定義為打贏海上作戰，更強調多軍種聯合作戰中海軍之任務及海上優勢之形成，且重視海軍對塑造和平時期環境與控制危機之重要性，具備國家戰略之高度，且任務之多樣，已看出為配合美海軍前沿部署所做的規劃。顯見澳大利亞海上作戰能力已隨著美國瀕海戰略之轉變

註1：周德華、陳炎、陳良武著，《藍色方略—二十一世紀初的海洋與海軍》(北京：海潮，2004年1月)，頁237。

，而更加強調支援其他軍種作戰，以配合實現美國將作戰重心從海洋轉移到敵方沿海的戰略需求²。

貳、澳大利亞新世紀之海洋戰略環境

以國家利益為互動基礎的國際戰略環境中，國家為了生存不是以追求安全為目標，就是以積極追求國際權力為目標。就澳大利亞而言，亞太地區對澳大利亞的重要性不只僅限於區域經濟貿易層面，也包含了國家安全層面³，為了確保國家安全，外交結盟政策成了澳大利亞維持區域安全的主要考量，因而使澳大利亞21世紀的海洋戰略環境與美國海軍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美國在亞太的戰略考量與兵力部署藉著美澳雙方對「前沿部署」(Forward Presence)的認同⁴，影響著澳大利亞海軍的發展及區域戰略環境，使澳大利亞從任務規劃至建軍理念朝向區域安全與海上合作的主導地位前進⁵，在2009年之《澳大利亞2030軍力國防白皮書》中，澳

大利亞政府為其國防軍規定了四大戰略任務，分別是：打敗對澳大利亞的進攻並維持嚇阻、維持南太平洋地區及東帝汶之穩定與安全、維持亞太地區穩定與維護國家利益並支持全球安全⁶，這四大戰略都直接或間接地與國際行動聯繫在一起。顯見澳大利亞在新世紀裡更加注重過「塑造」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來促進本國的安全，特別是保障對於澳大利亞而言生死攸關的海上交通線的安全⁷。故探討澳大利亞海軍戰略中對於海洋戰略環境之認知應由後冷戰之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與海洋戰略隨威脅形態之轉變過程與區域安全思維的納入及因應之軍事行動原則與任務加以說明，而美國海洋戰略正是最大的影響因素(整理如表一)。

一、受美國影響之國家安全戰略

美澳兩國的戰略利益共生關係，自冷戰結束以來即明顯存在，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一直實施「…自海上出發」戰略，作戰重點由過去奪取制海權轉變為協助奪取陸上控制權⁸。而比較不同時期美澳兩國的戰略思維(

註2：同註1，頁20。

註3：黃恩浩，〈澳洲區域海上安全戰略與武力規劃：一個中等國家的安全建構〉(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政治外交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年6月)，頁113。

註4：「前沿部署」(forward presence)，中國大陸學者多譯為「前沿存在」。美國維護其海上利益之方法主要有：第一，透過對美國「前沿存在」的認同，配合部署軍事力量，加強對地區以及運輸資源的海上咽喉要道的控制，保護海上利益安全。第二，利用國際組織和國際法規，採用軟硬兼施的策略，遏制世界核擴散的態勢。第三，調整戰略，注重「非正規」、「非戰爭」的作戰模式，加強特種部隊建設和海空作戰力量的運用，對付國際恐怖活動。第四，實行參與戰略，通過政治、經濟、軍事多方面介入和利用多邊形式保持關注地區的穩定。第五，保持海上軍事實力的優勢，除了竭力發展海上武力之外，還重視發揮海上軍事力量的威懾作用。王立東，《國家海上利益論》(北京：國防大學，2007年9月)，頁40。

註5：Australian Government《Defense White Paper 2009》，2009，pp.33-38。

註6：同註5，頁53-54。

註7：劉樊德，《澳大利亞東亞政策的演變》(北京：世界知識，2005年4月)，頁162。

註8：90年代中期美國對海上安全的籌劃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分析美海軍「…自海上出發」和「前沿…從海上出發」兩份戰略文件便可看出美國冷戰後海上安全戰略籌劃的主要內容和基本特色：第一，突出海軍干預地區性事務的地位和作用。第二，強調了海軍力量在和平時期前沿存在的重要意義。第三，明確美國的主要作戰對手和主要作戰海域。因此美國海軍未來的作戰區域基本在兩個範圍內進行：一是向海方向的「制海作戰」，二是向陸方向的「制陸作戰」。張煒主編，《國家海上安全》(北京：海潮，2008年8月)，頁196。

表一 澳大利亞國家戰略、國防戰略及海洋戰略之演進發展與核心概念

年份	國防文件	國家安全戰略	國防戰略概念	海軍戰略內容
1987-1993	1987-1993 國防白皮書	美澳同盟關係下之自我防衛 (Self-reliance)。	防衛澳大利亞及強調海洋戰略。	重視區域及全球之影響，聚焦於北澳海域之安全。
1994	1994 國防白皮書	不再強調與美國之同盟關係。	支持全球安全，加強區域防衛。	擴展海軍防衛能力，重視海上縱深防禦 (Defence in Depth)。
1997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 (ASP97)	回歸與美國之同盟關係。	確立以海洋防衛取代大陸防衛之方向。	強調海軍對地區事務及和平任務之功能與貢獻。
2000	國防白皮書 Defence 2000	強調美澳同盟並重視鄰近地區之安全。	執行軍事事務革新 (RMA) 並重視非對稱威脅。	以聯合作戰概念強調控制澳大利亞海空航道使海洋戰略包含陸空軍之運用。
2010	國防白皮書 Force 2030	在美澳同盟之基礎下發展地區及全球安全戰略。	強調區域安全與非傳統威脅。	持續強化海軍建設並創造海軍多元化之任務發展及強調武力投射能力。

資料來源：Australia Government 2004-2005 Research Brief No.4，〈Australia's Maritime Strategy in the 21st Century〉，頁 12-15，本研究整理製作。

表二 冷戰後美國海洋戰略及澳大利亞相對戰略

時期	美海洋戰略	核心概念	澳大利亞國家安全戰略
冷戰末期	1986前進海洋戰略《Forward Maritime Strategy》	一、保持大洋及重要航道之制海權。 二、沿海及沿岸複雜環境聯戰能力。 三、保障向陸上投射兵力之能力。	一、加強美澳同盟。 二、集體安全防禦。 三、自主防衛。
90年代	1992由陸至海《From the Sea...》1994 前沿...由陸至海《Forward From the Sea...》	一、突出海軍干預地區性事務的地位與作用。 二、強調海軍力量在和平時期前沿部署的重要意義。 三、明確美國的主要作戰對手及作戰海域。	一、持續加強美澳同盟。 二、強調地區安全合作及海外駐軍。 三、建立強大的海上武力以維持地區穩定。
21世紀初	2002 21世紀海權《Sea Power 21》	一、把美國的海上安全邊界推到其他國家的近海水域。 二、以強勢海軍力量支撐美國獨霸地位。 三、提出海上安全倡議，主導世界海上安全秩序。	一、持續加強與美國的海上安全合作。 二、保持一支強大的海上力量。 三、創造海上安全環境。 四、注重海軍在盟軍整體海上作戰能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製作。

整理如表二)，更可知澳大利亞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之架構主導下，逐步發展出相對之國家安全戰略以密切配合美國行動。

在美國911事件之後，更拉近了美澳之間在國際上政治與軍事合作關係，這層軍事同盟關係使澳大利亞在軍事研究、情報交流、軍事技術轉移等合作領域獲得相當大的助

益，如果沒有美國提供技術與訓練，澳大利亞國防軍 (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ADF) 根本無法成為現代化的軍隊。正因為美國在亞太的駐軍對澳大利亞相當重要，因此維持並強化與美國同盟關係已經是澳大利亞最高的安全戰略目標⁹。相對的，在同盟關係的互動中，澳大利亞也必須持續對美國表

註9：Australian Government 《Defense White Paper 2009》，2009, pp.93-95.



現其戰略功能，如共同反恐行動、情報分享、區域外交，以及建立一支可觀武力以充當美軍區域作戰的軍事夥伴。

二、非傳統威脅與區域安全考量下的國防戰略

分析《澳大利亞海上準則》的海軍之任務光譜圖(如圖一)，可知澳大利亞現今對非傳統威脅下國防戰略的認知，從傳統意義上來看目前其國家是安全的，因為其地理環境的相對獨立、與鄰國友好關係、南太平洋地區國家間發生衝突機率低、強大的武裝力量以及與美國之間緊密的聯盟關係等因素¹⁰，使傳統威脅所引發的戰爭，逐漸向光譜中的一端集中，且所佔比例已愈來愈小；同時，在任務光譜所列的17項任務中，亦可知道澳

大利亞國防軍對未來任務執行與建軍方向的規劃隨區域安全之觀念而更加重視非傳統意義上的安全，在光譜中「非戰爭軍事行動(Military Operation Other Than War, MOOTW)」及「和平」任務也隨著環境、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WMD)(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擴散、毒品、難民及愛滋病等全球性問題不斷擴大。

澳大利亞結合了上述國際情勢的變遷與國防安全需要，在2000年發表的《澳大利亞國防白皮書》中，認為整體國防安全將在強化本土防衛的基礎上朝向海洋戰略方向發展，以擴大國防安全空間¹¹。而《澳大利亞2030軍力國防白皮書》內不僅強調將持續強化與美澳同盟關係以確保其國家及廣泛區域安全，亦要維持與鄰近國家(主要是指印尼、紐西蘭、紐幾內亞及東帝汶)關係的穩定，以做為澳大利亞在亞太的安全緩衝地帶¹²，《澳大利亞海上準則》亦呼應了上述思維¹³。簡言之，澳大利亞新世紀的國防戰略特色是從過去本土前進防衛政策調整為「前沿反應」(Forward Response)，並著重亞太區域安全¹⁴。在此國防政策中，美澳安全同盟是確保區域安全與澳大利亞國家安全的基礎

註10：劉樊德，《澳大利亞東亞政策的演變》(北京：世界知識，2005年4月)，頁145。

註11：澳洲在2000年《澳洲國防白皮書》認為「當鄰國逐漸增加與提升他們的軍事力量時，澳洲若不增強其國防力量以因應之，澳洲將會開始失去抵抗入侵的海空防禦優勢。」此報告提出澳洲國防建設應建立於三個基本原則：第一為國防自立(Self-reliance)，第二為海洋戰略(Maritime strategy)，第三是先發制人的行動(Proactive Operations)。此外，這白皮書亦聲明澳洲國家安全政策目標包括：維持強大軍力以保衛領土安全、堅持與美國的同盟關係、支持亞太地區的多邊合作機制、積極維持周邊國家的安全與穩定、參與維和行動，以及積極參與聯合國事務。黃恩浩，〈澳洲區域海上安全戰略與武力規劃：一個中等國家的安全建構〉(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政治外交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年6月)，頁127。

註12：Australian Government 《Defense White Paper 2009》，2009, p.42.

註13：在準則內第五章說明澳洲追求穩定的戰略環境須建立在四個目標之下：一、澳洲的本土安全，二、直接鄰近國家的安全，三、亞太地區的戰略穩定，四、在遵循制度下的全球穩定，並強調將透過軍力部署之方式達成並維持上述各戰略層次的安全與穩定。Australian Navy 《Australian Maritime Doctrine》，2010, p.41.

註14：黃恩浩，〈澳洲區域海上安全戰略與武力規劃：一個中等國家的安全建構〉(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政治外交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年6月)，頁127。

，並以兼顧「自我防衛」(Self-Defense)與「安全合作」(Security Cooperation)為主要方向¹⁵。

參、澳大利亞海軍三位一體任務面向

「前沿部署」概念使美軍再次強調海軍之位置，美國認為海軍必須執行前進作戰，因前進作戰被視為顯示美國承諾，嚇阻區域衝突，作危機管理所必要¹⁶，然因應不同的區域威脅挑戰與達成目標，在任務區分上，將海軍的作用設想為一個三位一體的組合，即軍事作用、外交作用和警察作用。在《澳大利亞海上教則》內亦看到相同的概念，強調海軍武力在外交及警察方面角色之重要而非僅是軍事角色¹⁷(如圖二)；除此之外，《澳大利亞2030軍力國防白皮書》同時強調海軍武力在和平時期與危機時之重要性¹⁸。由此可知，澳大利亞對戰略環境的認知上已經再次確定其前進防禦的戰略方向，澳大利亞海軍不僅被要求要扮演著國家安全重要角色，亦要在亞太地區積極承擔著警察與外交的任務。

一、澳大利亞海軍的軍事作用力

軍事作用力是三位一體的基礎，因為軍事性質是軍隊的實質。正是海軍進行威脅和



圖二 澳大利亞海軍三位一體之任務分配

資料來源：Australian Navy 《Australian Maritime Doctrine》，2010, p.100.

使用武力的能力給予其他方式的行動以實際意義；它的外交影響來源於它的軍事性質，而警察作用既針對國內又針對國外。在《澳大利亞2030軍力國防白皮書》指出，澳大利亞國防軍必須具備處理國內、國外、地區與全球各類潛在狀況的能力，並提供包含遠征兵力乃至國內安全等選項¹⁹，且澳大利亞當局一直強調，儘管重視遠征戰力，但其國防軍仍必須支援國內安全與邊防守護任務，而澳大利亞界定其主要的戰略利益地區是與澳大利亞最近的東南亞和南太平洋地區，國防政策也著重於保護澳大利亞大陸及周邊海域免遭低強度的可能威脅²⁰。就此一方面而言，澳大利亞已經超越軍事轉型的「作戰方式」

註15：Australian Government 《Defense White Paper 2009》，2009, p.20.

註16：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研究報告，張台航等譯，《21世紀的美國海軍戰略》(桃園：國防大學，2006年8月)，頁193。

註17：Australian Navy 《Australian Maritime Doctrine》，2010, p.100.

註18：為了維持澳洲永久的戰略利益，《澳洲2030軍力國防白皮書》提出五個途徑：第一、避免不穩定的戰略競爭在美國、中國與日本關係中發生；第二、防止亞太強權的崛起，或防範一群強國的戰略利益與澳洲利益相衝突。第三、維持東南亞地區和諧環境，促進各國尊重彼此的領土完整；第四、防止強大的軍事力量在鄰國部屬並與澳洲利益相抵觸；第五、防止大規模武器破壞的擴散。同註17，頁30-40。

註19：Australian Government 《Defense White Paper 2009》，2009, p.38.

註20：劉樊德，《澳大利亞東亞政策的演變》(北京：世界知識，2005年4月)，頁144。

表三 澳大利亞海軍三位一體之任務概念與實踐

	海軍任務型式		
	軍事性	外交性	警察性
戰略概念	防範來自海上的入侵以確保澳大利亞本土安全。	配合美國建立並執行海上安全機制。	主動介入並負責鄰近地區(印尼、紐西蘭、巴布亞紐幾內亞、東帝汶及南太平洋島國)之安全。
戰術實踐	在美國優勢下提供澳大利亞海上安全保障並注意中國崛起後之亞太情勢。	海軍外交、海上聯合演習、軍事援助、裝備聯合開發與人員交流、海上合作對話、海上聯合監測機構之設立。	一、維護海上交通線、港口安全。 二、加強海岸警衛杜絕非法移民、走私。 三、積極參與聯合國組織的警察性活動。

資料來源：Australian Navy，《Australian Maritime Doctrine》，2010年，本研究整理製作。

面向，而跨足至整合「境內」與「境外」更加廣泛的軍事任務。

二、澳大利亞海軍的外交性任務

海軍傳統外交作用指涉及不實際直接使用武力但確憑藉存在之武裝實力，以創造特定的談判形勢或於普遍的國際交往中支持國家政策，達成《澳大利亞海上教則》中「預防外交」(Preventative Diplomacy)²¹；除此之外，近年來全球的天然災害使美國主導之「救災外交」(Disaster Diplomacy)²²，在世界各地投入軍力執行災害應變，並透過有能力夥伴國之加入，以達成美國與其他國家及其部隊有效進行雙邊合作的機制²³。在此前提下，使澳大利亞成為提供周邊國家人道援助及緊急救援之領導地位，例如2004年印度洋海嘯，澳大利亞派遣兩棲登陸艦前往支援並提供重要緊急物資，2005年之蘇門達臘大地震、巴基斯坦地震及2008年之緬甸風災均可見澳大利亞國防軍前往支援。

三、澳大利亞海軍的警察性任務

澳大利亞在區域安全與前進反應(Forward Response)的指導下，決定了澳大利亞海軍在未來勢必要重新走向藍海的戰略構想，澳大利亞除更加重視非傳統安全，並以強大的海軍實力肩負起海上秩序的維護，且持續參與區域穩定與軍事維和行動，這亦凸顯了澳大利亞海軍的警察性質。例如：1999年的東帝汶危機中，在聯合國安理會同意下，澳大利亞派遣了16艘軍艦參與維和行動；於2006年東帝汶危機再次發生，澳大利亞又派出兩棲艦隊參與維和；在南太平洋維和行動中，澳大利亞海軍亦參與了2003與2006年索羅門群島危機與2006年斐濟政變的維和行動。由此可知，澳大利亞未來勢將藉海軍任務之警察性強化海軍力量在和平時期前沿部署的重要意義，且基於國家安全與利益之考量，更將持續扮演南太平洋地區領袖角色，積極派遣維和部隊協助周邊國家維持社會秩序。

註21：Australian Navy《Australian Maritime Doctrine》，2010, p.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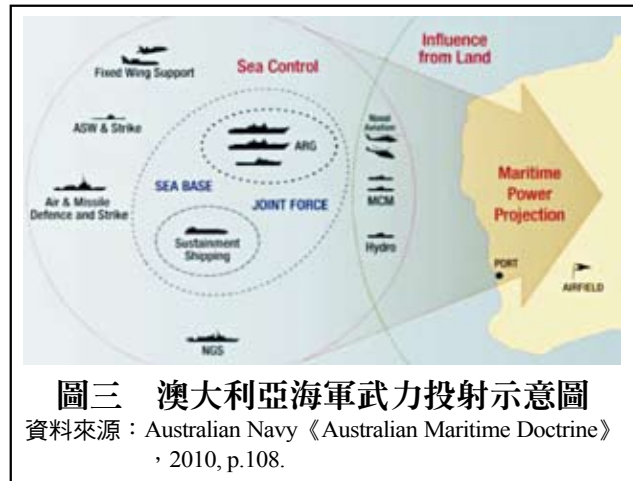
註22：指美軍藉由軍力投入於他國之災害應變、醫療及公衛援助及訓練，達成或帶來強大的公關效應，藉由服務災民而奠定堅實的友好基礎，進而促進美國廣泛的戰略與外交政策利益。查爾斯·派里(Charles M. Perry)著，李永悌譯，《臨危不亂：救災外交、國家安全與國際合作》，(臺北：國防部，2011年1月)，頁117。

註23：同註22，頁248。

由澳大利亞海軍的三大任務發展及分類可知：澳大利亞海軍之預期任務接續美海軍「…從海上出擊」之概念，明確的替濱海策略之背書：要能在未來預期之作戰區域(Operational Environment)建立制海能力，需調整海軍兵力規模並具備武力投射能力及在濱海區域或陸地海岸線(Offshore and Littoral warfighting)之複雜作戰環境中所須具備能力²⁴。藉分析其任務規劃及兵力整建，可知道未來之海軍戰略方向源自國家安全戰略，亦代表澳大利亞海軍跟隨著美海軍之腳步，離開「在海上之大洋作戰」而朝向「執行從海上出擊之武力投射及陸岸聯合作戰」之基本轉變²⁵，(概念整理如表三)。

肆、澳大利亞海軍21世紀的軍事轉型

依據澳大利亞對21世紀亞太地區情勢的認知，預判未來此區將是世界政治經濟領域最活躍的一個舞台²⁶，而澳大利亞海軍也將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在印度洋海域，澳大利亞海軍出場的次數也將有增無減，特別是重要地區(Focal Area)的海上安全形勢將對澳大利亞海上交通線的安全形成重要影響²⁷，且美國這個最重要的盟友也需要澳大利亞海軍在亞太及印度洋分擔更多的職責，在新挑戰、新任務之兵力需求下，使參與



圖三 澳大利亞海軍武力投射示意圖
資料來源：Australian Navy《Australian Maritime Doctrine》，2010, p.108.

美海軍21世紀的軍事轉型成為必然的選擇。

在任務形態的認知上，美國海軍認為無論在戰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海軍的使命都是通過海洋向海上的沿海地區水域和近海實施兵力投送並保持壓力²⁸，這種概念實際上是一種嚇阻與威脅力量之運用。而澳大利亞海軍戰略內「武力投射」的概念則是以美海軍21世紀的海洋戰略觀點為主體，在「武力投射」的同時包含了「海上控制」概念，並且包含了「海上打擊」之精準打擊、「海上盾牌」之區域介入、「海上基地」之集中後勤等眾多概念(如圖三)。簡而言之，其整體建軍規劃與考量乃是因應在未來作戰中，澳大利亞海軍將可透過對沿海水面的控制來確保軍力能完整而安全地投射在任何陸地上²⁹。

一、發展海上打擊

「海上打擊」是美海軍〈廿一世紀海權

註24：《澳洲2030軍力國防白皮書》第九章之海軍部隊之能力及第十章內對澳洲國防軍之預期任務內，即加入兩棲作戰、武力投射及濱海作戰之概念，強調此能力為未來可能衝突所必須。Australian Government《Defense White Paper 2009》，2009, p.73、88。

註25：劉樊德，《澳大利亞東亞政策的演變》(北京：世界知識，2005年4月)，頁144。

註26：Australian Government《Defense White Paper 2009》，2009, p.16。

註27：Australian Navy《Australian Maritime Doctrine》，2010, p.78。

註28：徐舸等合編，《瀕海總動員-21世紀的海軍戰略》(江蘇：人民，2000年8月)，頁17。

註29：同註28，頁24。



計畫〉的基礎能力。簡而言之，海上打擊作戰無外乎將艦隊駛到敵對勢力的近海，利用艦載武器、航空兵、陸戰隊登陸部隊實施的一種火力投送。這種方式在計畫中被賦予了新的含義，即利用海上基地，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對任何國家從海上任意實施打擊³⁰。故較以往的海上攻擊有了決定性的變化：從小規模特種作戰、戰斧巡弋飛彈攻擊、到類似伊拉克戰爭這種大規模遠征作戰，無論作戰空間、時間、作戰對手情況如何，都可以實施廣域的靈活打擊。

澳大利亞海軍規劃之海上打擊的主要力量有兩種，一是以海軍特遣艦隊為主實施的遠程精確打擊，具體而言，即利用航空兵力

或水面作戰艦實施巡航導彈之戰術打擊 (Strategic Strike)；二是海軍陸戰隊、遠程打擊群為主從海上發起的機動作戰，概念的實質是將海上基地作為近海作戰和向岸上投送武力 (Force Projection) 的手段³¹，並以與海軍聯合作戰為基礎，在海軍的火力支援下，使部隊從兩棲艦艇直接到達內陸目標附近，而非建立大型灘頭基地後再發起攻擊³²。

在遠距精準武器方面，澳大利亞目前執行的「後續遠距武器 (Follow-on Stand-Off Weapon)」，計畫將F-111戰略轟炸機更新為美製F-35聯合打擊戰機的陸用型，且配備衛星導引精準武器，如「聯合遠攻武器」等。

註30：王平建、侯建軍、李杰編著，《美國未來海軍》(北京：共軍，2007年1月)，頁119。

註31：Australian Government《Defense White Paper 2009》，2009, p.61.

註32：徐舸等合編，《瀕海總動員-21世紀的海軍戰略》(江蘇：人民，2000年8月)，頁24。

此外，澳大利亞國防軍不排除可能會在未來十年內採購無人戰鬥飛行載具，以強化遠距精準打擊戰力，同時為擴大F-18及F-35戰機的作戰半徑，澳大利亞已開始接收5架新型空中加油機³³，因為澳大利亞當局堅信，在新的戰略環境中，必須在遙遠的戰場上與聯軍部隊併肩作戰。另外，澳大利亞採購的2艘新型兩棲登陸艦也將強化其對近岸作戰能力，這項需求是經澳大利亞當局確認應為其海軍變革的重點項目之一，除了能運送部隊與車輛，還配備能執行兩棲突擊的登陸艇和支援登岸部隊作戰的指揮管制設施(如圖四)。

二、強化海上盾牌

「海上盾牌」是〈廿一世紀海權計畫〉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美國海軍發展「海上盾牌」的目的是：以基於海上控制、前沿部署和網路化的多層全球防禦力量保護國家利益，「海上盾牌」不僅將海軍傳統的任務，如防空、反潛、反水面、水雷等類型作戰和保護海上交通線暢通等納入其中³⁴，而且於911事件後更將「加強本土防禦」納入了防護範圍，將美國的安全向海洋延伸。除此之外，發展「海軍部隊向內陸縱深投送防禦力量」及「保護岸上聯合部隊及盟軍」的能力，透過巡弋飛彈將防護能力延伸到內陸縱

深。

「海上盾牌」的核心概念是「獲得前沿戰區的作戰空間優勢」，方式為透過為作戰提供空中和導彈防禦能力、在海上和瀕海地區控制作戰空間、在淺水區域探測潛艦、清掃敵方部署水雷能力等。而其主要作戰能力之需求來自於戰區飛彈防禦系統(Anti-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ABMD)、濱海作戰艦(Littoral Combat Ship, LCS)、多任務無人飛行器、新型反水雷裝備等(如圖五)。

根據《澳大利亞2030軍力國防白皮書》修訂，澳大利亞已經明白表示為了因應未來海上戰場，澳大利亞海軍將從西班牙以80億澳元引進3艘改良的F-100型驅逐艦，稱為霍巴特級(Hobart-Class)防空驅逐艦，並計畫要在未來以約30億澳元升級其安扎克級(Anzac-Class)防空系統，以提升澳大利亞海軍武力投射與區域空防能力；另外在水下兵力部分，澳大利亞亦規劃保持6艘升級的柯林斯級(Collins)潛艦，以為武力介入時之保障³⁵。

三、創造海上基地

〈廿一世紀海權計畫〉內的「海上基地」概念，是指利用指管系統控制疏散配置的兵力，並通過機動、自主的作戰平台支援聯

註33：Elinor Sloan著，黃文啟譯，《軍事轉型與當代戰爭》(臺北：國防部編譯，2010年6月)，頁95。

註34：美海軍「海上盾牌」計畫大力凸顯傳統兵力的防護任務—空防、獵雷、反潛—並確保進入濱海地區的能力。「海上盾牌」的概念強調以防護力之投射，做到全球防護的再保證，傳統上，海軍所提供的防護對象是作戰部隊本身與交通線。今後的海軍當然這些任務一個也不能少，但是可能會更多：海軍可能要具備特遣隊以外的防護技術，提供戰區與戰略防護傘。簡言之，美國海軍的確是準備要在國土防衛上扮演要角，敵人不是昔日的海上侵入者，而是配備大規模殺害武器的彈道飛彈。海基式中段攔截系統眾所周知的設計目的是保護人口稠密區域，免於彈道飛彈威脅。從事國土防衛的海軍艦隻任務轉趨於具有戰略的意涵，一如彈道飛彈潛艦所負的戰略任務般。但是當海軍艦隻任務愈來愈像彈道飛彈潛艦所負的任務時，前者所擔負的其他任務就可能捉襟見肘了。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研究報告，張台航等譯，《21世紀的美國海軍戰略》(桃園：國防大學，2006年8月)，頁356。

註35：Australian Government《Defense White Paper 2009》，2009, pp.71-72.



美軍概念

建立防護所有艦隊的能力，免於遭受攻擊，這些能力包括由水面艦與航艦艦載飛機所提供的飛彈與空防，以及反制敵傳統潛艦、小型艦艇、水雷所構成的阻絕進入之戰力。

- 國土防衛
- 海上/濱海優勢
- 戰區空中與飛彈防衛
- 兵力進入能力

澳洲實踐

- 澳洲將採購3艘神盾級驅逐艦，並為其配備射程長達370公里的標準六型防空飛彈(Standard Missile 6, SM-6)，以增強艦隊的防空能力。
- 澳洲將採購8艘多用途護衛艦，以取代現役的「安扎克級」(Anzac class)護衛艦。新型護衛艦除能夠搭載拖曳聲納，以強化其潛艇偵測能力外，並且能夠搭載直升機與無人飛機(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UAV)

圖五 美軍「海上盾牌」概念與澳大利亞海軍建軍規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製作。

美軍概念

泛指以所有海上後勤力支援濱海地區的營、旅級軍事作戰的海軍與陸戰隊各項計畫。

- 聯合作戰裝備前置水準
- 迅速部署與運用能力

澳洲實踐

- 將在未來10年內服役的海軍艦艇還包括：1艘可搭載一定數量的直升機和車輛、排水量達1-1.5萬噸的大型戰略性海上補給艦（替換現役的2艘較老舊的勝利級補給艦）；2艘甲板可搭載直升機的兩棲登陸艦，可在本地區進行人道主義救援和災害救濟；6艘可運輸裝甲車、卡車及大宗補給品的重型登陸艦。

圖六 美軍「海上基地」概念與澳大利亞海軍建軍規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製作。

合作戰，從海上投送、保護、維持整體作戰力量³⁶。美國在2003年提出「全球聯合作戰」的新戰略，其核心內容是打造具備獨立作戰能力的海軍和海軍陸戰隊聯合部隊，以此實現海上基地的建設，以便於戰時在不能確定可以在戰區附近國家領土建立基地的情況下，能夠實施持續作戰，即從「海上基地」實施海陸空聯合攻勢作戰。在阿富汗反恐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海軍及海軍陸戰隊以海上艦船為基地所進行的攻勢作戰就已經充分驗證了「海上基地」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對澳大利亞海軍而言，「海上基地」最大的目的是解決作戰地區兵力部署、展開、維持所需的基地，且通過確保海上控制，獲取部隊機動的空間，以維持、投入遠征作戰部隊，將登陸作戰部隊的風險降到最低。而其組成的要素即為兩棲打擊群(Amphibious Ready Group, ARG)及大量的後勤艦艇，透過海上預置(Maritime Pre-positioning)方式³⁷、戰鬥後勤部隊(Sustainment Ships)等海上兵力，構成根據軍事行動規模大小、任務可由一類或多類基地要素在作戰地區構築一個或多個海上基地³⁸，其最大的特點即改變澳大利亞海軍作戰部隊的支援和補給方式(

如圖六)。

為了能夠部署與維持強大的遠征部隊及後勤補給，澳大利亞國防軍正積極籌建戰略海空軍運輸能力。目前除接收向美國採購的4架C-17全球霸王大型運輸機外，未來亦將擁有2艘兩棲登陸艦³⁹。這些軍艦將用於執行各種不同的任務，包含維和、區域災難救援乃至作戰行動，一次可載運一個營的兵力和重型戰車在內的150輛各式車輛，艦上同時還設置6個停機坪，以便執行空中任務。

四、建構武力網

「武力網」是美國海軍在21世紀實施網路中心戰的基礎，與「海上打擊」、「海上盾牌」、「海上基地」同為美海軍軍事轉型的四大「海軍能力支柱」，在這四大支柱中，「武力網」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三大作戰概念所闡述的能力將通過「武力網」，轉化為21世紀美國海軍的強大戰鬥力。現今學者認為其核心概念為：

透過一套系統，採用開放式的聯合體系結構，以強大、安全和可升級的方式把岸上、海上和空中的作戰部隊鏈結起來從而形成一系列高度聯合的分布式網路，使美國海軍更有效地獲取訊息、共享訊息和使用訊息，

註36：「廿一世紀海權計畫」所彰顯的「海上基地」概念來自在當今的國際環境下，美國已發現美軍對內陸國家作戰時，同意美軍在本國領土上展開作戰部隊的國家越來越少。而美國海軍未來在反恐戰爭中發揮更大作用、對聯合作戰的貢獻，就不應把眼光僅限於對陸攻擊，必須在海上建立可以支撐全部作戰的基地，全面發揮作用。「海上基地」的重點是海運、空運、戰鬥後勤部隊、運輸和彈藥庫存，主要負責戰區內、戰區間的投送能力，以及彈藥等裝備是否滿足作戰的需求。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研究報告，張台航等譯，《21世紀的美國海軍戰略》(桃園：國防大學，2006年8月)，頁356。

註37：「海上預置部隊(MPF)」之概念是指將大部分作戰裝備預先部署在遠海，形成強大的海上基地，以減少對本土港口和機場等易被攻擊目標的威脅與依賴。作為海上基地的一部分，在聯合部隊的保護下，海上預置部隊可以在戰區內外實現裝備和貨物的快速運輸，更有效地支援岸上部隊的作戰行動，減少兵力及裝備的投送時間，提高反應效率，增強戰略機動性。廖文中，〈美國海軍提出新的『全球作戰概念』〉。

註38：Australian Navy《Future Maritime Concept-2025》，2005, p.19.

註39：Australian Government《Defense White Paper 2009》，2009, p.80.

美軍概念

- 特遣部隊、感應系統與武器之多重式組合
- 分散而協同的指揮與管制設計
- 兼具彈性與韌性的多管道網路系統
- 適時適地與自動功能的決策輔助系統
- 以人為中心的整合機制

澳洲實踐

- 軍事裝備在更新、升級及外購過程中，將繼續注重考慮武器水平、與他國（美國、英國、紐西蘭等盟友）軍隊間的“互通性”和遠程偵察及投送兵力能力的顯著提升。
- 澳洲國防部還將採購8架海上巡邏機，以取代現役的AP-3C獵戶座（Orion）海上巡邏機；7架具備高空、長距離巡弋能力之大型無人飛機。澳洲還將加強其衛星與網路技術，並且設立網路戰部隊，以保障澳洲未來的國防安全所需。

圖七 美軍「武力網」概念與澳大利亞海軍建軍規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製作。

以保障在地理上分散部署的美國海軍部隊在各種軍事行動中獲得相關的優勢，並落實於戰場指管通資情監偵(C4ISR)之中⁴⁰(如圖七)。

澳大利亞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開將強調先進情報、監偵戰力的重要性，特別專注於長程、持久的無人飛行載具，以補強甚或取代其現役的AP-3C獵戶座(Orion)海上巡邏機；並在2006年便已將高空、持久無人飛行載具獲得列為最優先項目，預期採購的系統，就是美國的「全球之鷹」(Global Haw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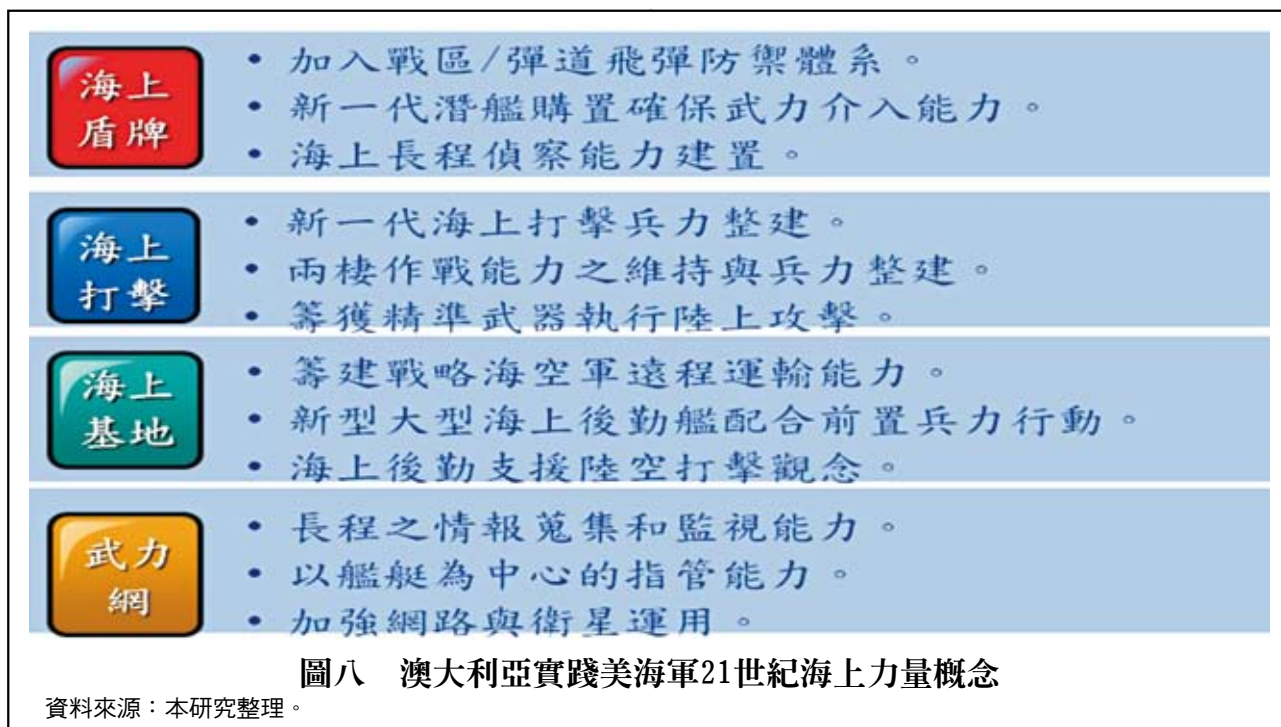
無人飛行載具⁴¹。負責執行海上巡邏和澳大利亞領土範圍內的地面監視任務，提供海外軍事連續性監視戰力。另外，澳大利亞自2008年開將接收6架空中預警管制機，目前也正在執行艦艇與其他載台的LINK-16數據鏈路整合工作，最後更將採用LINK-22數據鏈路系統⁴²，並預劃在2020年完成建置網狀化戰力。預判未來澳大利亞海軍的網狀化戰力將以新式的防空驅逐艦為核心，與聯合打擊戰機，空中預警管制系統和陸基防空等系

註40：美軍建構「海上打擊」、「海上盾牌」、「海上基地」能力以達成軍事轉型的基礎是建立在「武力網」的設計上面。

「海軍軍事轉型路線圖」將「武力網」視為推動海軍網絡作戰的架構。「武力網」是由海軍軍令部長所屬的戰略研究團隊提出，目前是以「網絡作戰」或是「下一世代網絡作戰」等各種不同名稱流傳。根據克拉克上將的說法，「武力網」是落實網絡作戰的一套計畫，作法是「將戰鬥人員、感應系統、指揮管制、作戰平台、武器裝備等加以整合，使之成為連線而分散的武裝力量」。這套經過連線處理的網路系統將是資訊時代海軍作戰的骨幹。「武力網」的概念一如一張大傘，下面覆蓋著現階段的推動的「海軍及陸戰隊內部網路」(NMCI)、「21世紀的信息技術」(IT-21)、「合作接戰能力」(CEC)、「海軍火網系統」(NFN)等計畫，以及未來的「特遣指揮、管制、通信、電腦、作戰系統座標方格」(EC5G)等不同子計畫。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研究報告，張台航等譯，《21世紀的美國海軍戰略》(桃園：國防大學，2006年8月)，頁356。

註41：Australian Government《Defense White Paper 2009》，2009, p.80.

註42：Elinor Sloan著，黃文啟譯，《軍事轉型與當代戰爭》(臺北：國防部編譯，2010年6月)，頁96。



統進行網路鏈結，同時整合其他各類海軍艦艇。

伍、結語

海軍具有公海上的戰略機動性，是阻止衝突形勢升級的首選力量，且海軍具有對陸上採取決定性早期行動的多方面能力，是控制危機與遏阻衝突之必須，海上力量所擁有靈活性與機動性更是遏制潛在侵略者威脅的最佳條件。由澳大利亞海軍戰略發展趨勢可知，澳大利亞國防軍不再只關注國土防禦，而是一支以海軍為主體，可成為迅速、敏捷且多功能的防衛與打擊部隊，隨時可應徵召

並迅速因應澳大利亞本土以外的各種任務，從反恐及國際和平行動，乃至於區域援助與救災等，均包含於澳大利亞海軍多元化任務中。

此外，由本研究分析整理可知，澳大利亞新世紀的軍事轉型計畫源自美海軍所提出的〈廿一世紀海權計畫〉(Sea Power 21)⁴³，此計畫使澳大利亞海軍對21世紀前30年的建軍有了明確的走向，其重點為利用強大的非對稱海上優勢，在指管系統「武力網 (Force Net)」的支持下通過對「海上打擊 (Sea Strike)」、「海上盾牌 (Sea Shield)」、「海上基地 (Sea Basing)」三種核心作

註43：〈廿一世紀海權計畫〉(Sea Power 21)堪稱是最完整的一份美國海軍軍事轉型藍圖，該報告是於2002年7月由美國海軍軍令部長克拉克(Vernon Clark)上將在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公諸於世，被視為是傳承於「從海上前進」(From the Sea and Forward)與「來自海上」(From the Sea)兩份冷戰結束後的戰略文件，將根本地轉化美國海軍的戰爭觀，從藍色海軍艦對艦的陣仗轉變為濱海地區兵力投射的模式。但是「廿一世紀海權計畫」遠基於「從海上前進」與「從海上來」兩份戰略指導之處在於前者不僅著墨於未來美國海軍於何處作戰，同時兼顧如何作戰的問題。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研究報告，張台航等譯，《21世紀的美國海軍戰略》(桃園：國防大學，2006年8月)，頁340。

戰要領，從海上投送精確和持續進攻力量，在全球或區域範圍內擴展海軍防禦，利用海洋這個機動空間，增強聯合部隊的獨立作戰能力和支援能力。隨著計畫的推行，在《澳大利亞2030軍力國防報告書》內未來發展之規模及方向已明顯的看到了美國〈廿一世紀海權計畫〉的影子⁴⁴（概念整理如圖八），預判未來在實現軍事轉型規劃之後，其武器裝備將進一步的現代化，成為一支攻守兼備的海上勁旅，以執行多元化的任務與挑戰。

綜上所述，由21世紀澳大利亞海洋戰略環境來看，澳大利亞海軍之戰略視角長期跟隨著美國發展，另基於對美國「千艦海軍」（1000-ship Navy）及「全球海洋夥伴關係」之支持⁴⁵，也對澳大利亞之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及海軍戰略產生根本上的影響，更加重視海洋戰略與海軍力量之運用與發展，除了將海上武力視為區域穩定中產生有效嚇阻的關鍵因素外⁴⁶，更在2001-2030年澳大利亞海軍之建軍規劃中提出了三步走的發展方針⁴⁷，致力於以海軍為主體而發展的三軍海上聯合作戰能力之概念，更強調不同軍種的海上作戰能力⁴⁸，以我國作戰環境而言，未

來聯合作戰之場景與地點必為海洋及其上方空域，澳大利亞對其戰略環境之認知值得同樣以海洋國家自居的我們學習。

<參考書目(Bibliography)>

壹、中文部分

一、專書

1. 王立東，《國家海上利益論》，中國大陸：國防大學，2007年9月。
2. 王蜀寧，《海戰與戰略》，桃園，國防大學，2004年12月。
3. 張煒、馮梁，《國家海上安全》，中國大陸：海潮出版社，2008年8月。
4. 張文木，《論中國海權》，中國大陸：海軍出版社，2010年5月。
5. 周德華、陳炎、陳良武合著，《藍色方略-二十一世初的海洋與海軍》，中國大陸：海潮出版社，2004年1月。
6. 徐舸等合編，《瀕海總動員-21世紀的海軍戰略》，中國大陸：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
7. 劉樊德，《澳大利亞東亞政策的演變》，中國大陸：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4月。

註44：〈廿一世紀海權計畫〉當中採攻勢作為的「海上打擊」、採防禦作為的「海上盾牌」、以及採配合作為的「海上基地」三者是由「武力網」的概念加以組合，使「連線」構成未來美國海軍強大力量的基礎。「廿一世紀海權計畫」所烘托的願景內容包括兵力加倍器的作用、可能達成軍事轉型之處、系統連線的效果等，就是前美國海軍戰學院院長塞布洛斯基中將所長期倡議的網絡作戰概念，渠主張的網絡作戰概念正是「廿一世紀海權計畫」願景當中如何組織、整合、轉型美國海軍的張本，「武力網」不過是其外顯的表現形式罷了。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研究報告，張台航等譯，《21世紀的美國海軍戰略》（桃園：國防大學，2006年8月），頁340。

註45：Australian Navy 《Australian Maritime Doctrine》，2010, p.79.

註46：同註45，頁74。

註47：「藍色計畫」對2030年之前澳洲海軍的發展道路進行了描繪，從2001年到2010年後為第一階段，從2005年後到2025年後為第二階段，從2015年到2030年為第三階段。三個階段之間在時間上是交叉重疊的，這主要是考慮到海軍武器裝的發展有一個新舊交替的過程。周德華、陳炎、陳良武著，《藍色方略-二十一世初的海洋與海軍》（北京：海潮，2004年1月），頁258。

註48：Australia Government 2004-2005 Research Brief No.4，〈Australia's Maritime Strategy in the 21st Century〉，p.14.

8. 美國國防大學編，《海軍戰略》，中國大陸：海軍出版社，1990年1月。

Herbert Rosinski原著，Mitchell Simpson編，紐先鍾譯，《海軍思想的發展》，臺北：黎明出版社，1977年1月。

二、期刊

1. 林文隆，〈舊瓶新烈酒：『存在艦隊』-古典戰略的顛覆與創新〉，《國防雜誌》，第23卷，第3期，2007年11月，頁32-42。

2. 林文隆，〈海洋國家的海洋戰略與全民國防〉，《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5卷，第3期，2008年6月，頁1-22。

3. 林文隆，〈中華民國在區域海上安全合作中的角色〉，《第三屆海洋與國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1年11月，頁23-35。

4. 林文隆，〈海洋國家的海洋戰略與戰略規劃〉，《第一屆海洋與國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1年11月，頁65-84。

5. 宋吉峰，〈全球化下的常與變-兼具傳統與非傳統安全能力的中華民國海軍〉，《第三屆海洋與國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1年11月，頁108-123。

6. 陳偉華，〈嚇阻與防衛：概念的異同性〉，《國防雜誌》，第25卷，第2期，2008年5月，頁21-27。

7. 徐銘謙，〈從海洋治理的視角看兩岸海洋事務之發展與合作〉，《第一屆海洋與國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年11月，頁35-64。

8. 樂毅駿，〈論我國的海洋軍事外交-以如何拓展我國的「海洋事務活路措施」為例〉，《第一屆海洋與國防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2009年11月，頁1-22。

三、博、碩士論文

1. 黃恩浩，《澳大利亞區域海上安全戰略與武力規劃：一個中等國家的安全建構》，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年9月。

2. 周禮順，《東南亞區域安全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1月。

四、官方出版品

1. 國防部海軍司令部編印，《美海軍海上戰爭》，臺北：國防部，2006年11月。

2.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研究報告，張台航、陳德門、周茂林譯，《21世紀的美國海軍戰略》，臺北：國防大學編印，2006年8月。

3. Charles M. Perry著，李永悌譯，《臨危不亂：救災外交、國家安全與國際合作》，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2011年1月。

4. Elinor Sloan著，黃文啟譯，《軍事轉型與當代戰爭》，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2010年6月。

貳、西文部分

一、官方出版品

1. Australian Government《Australia's Maritime Strategy in 21st century》，2004.

2. Australian Government《Defense White Paper 2009》，2009.

3. Australian Navy《Future Maritime Concept-2025》，2005.

4. Australian Navy《The Navy Con-

tribution To Australian Maritime Operations》，2005.

5. Australian Navy 《Australian Maritime Doctrine》，2010. 

作者簡介：

林文隆上校，海軍官校75年班，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丹佛分校1997年資訊系統碩士，英國杜倫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2006年，現務於國防大學海軍指揮參謀學院。

宋蔚泰中校，海軍官校89年班，國防大學海軍指揮參謀學院101年班，現服務於國防部參謀本部訓練參謀次長室。

老軍艦的故事

渠江(雅龍)軍艦 PC-106

雅龍軍艦係日本海軍為因應二次世界大戰需求而建造的驅潛艦。1945年開工，1946年完工下水，命名為「四十九號」。由於當時大戰已結束，故該艦完工後，並未正式服勤參加任何戰役。

民國34年9月3日，日本投降後，盟國為徹底解除日本的三軍武裝力量，對其海軍決定將其部份艦艇拆毀，其餘艦艇則於拆除武裝後，由中、美、英、蘇四國以抽籤方式均分，該艦為我國分得第四批10艘艦艇中之一艘。民國36年10月4日舉行升旗典禮，暫時命名為「接三十」，隨後被正式命名為「海宏」驅潛艇，於民國38年9月成軍服勤。為因應防務需要，該艇加裝艦砲、重新武裝，並改裝為砲艦，民國40年1月改名為「雅龍」軍艦，編號PGM-106。

民國43年4月又奉令更名為「渠江」軍艦，編號PC-106，曾參加過許多戰役，戰功彪炳。其中赫赫有名的為鯉門島海戰一役，該艦艦長梁天價上尉因作戰有功獲頒青天白日勳章乙座，其他有功官兵亦均獲勳獎。民國45年10月1日，該艦因艦齡已老，維修困難，武器裝備亦不合乎現代化戰爭之需求，奉命除役。(取材自老軍艦的故事)

